普世價值與文化差異的交鋒

余創豪 chonghoyu@gmail.com

後真相時代



近年來，美國社會已經演變成「後真相時代」（Post-truth era），當中牽涉的因素有很多，但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興起，確實產生了推波助瀾的作用。這種「極端的多元化」表面上是民主與自由的勝利（每個人都有話語權），但在實踐上，它卻正在侵蝕人類賴以生存的理性和對話基礎。

在這種氛圍下，相對主義的論調再次蓬勃起來，我不時聽見這樣的論述：「自由、民主、人權、法制並不是普世價值，而是西方的價值觀，你不能用西方的一套去批評其他文化和制度。」「伊朗、阿富汗、沙地阿拉伯等社會是男尊女卑，西方社會傾向男女平等，這些文化差異顯示了沒有所謂普遍真理、普世價值。」

「是什麼」跳躍到「應該怎麼樣」

這些論述其實在哲學上已經有清晰的回應，首先，英國哲學家休謨（David Hume）指出：這是將「實然」跳躍到「應然」（What is-What ought to be）的謬誤，哲學界稱之為「自然主義的謬誤」」（Naturalistic fallacy）。某些國家存在着男尊女卑的現象，而西方社會重視女權，這是一個社會學和歷史學的事實，然而，事實陳述是否可以當為價值判斷呢？人類「應該」如何被對待？性別之間「應該」平等嗎？這是一個倫理學的原則性、真理性問題。僅僅因為不同文化對同一件事有不同的做法或信念，並不意味著這件事就沒有正確答案。

舉例說，在十七世紀之前，歐洲人認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，日月星辰環繞地球運行，提出日心說的哥白尼和伽利略被視為異端，這同樣是「認知上的差異」（實然）。但我們能因為這種差異，就推論出「天文系統是相對的，沒有普遍真理」嗎？顯然不能。太陽系

的結構是一個客觀事實，不隨人們的信念而改變。同理，某些文化盛行男尊女卑，只能證明該文化在特定歷史背景下發展出了這樣的社會結構，但並不能在邏輯上證明「男女平等」不是一個普遍應然的道德真理。當然，道德判斷不像天文學般能透過望遠鏡直接驗證，但文化差異的存在本身，仍不足以否定倫理上的普遍原則。



看似相反的例子

有些看似不同的文化表象，背後其實分享了相同的「普遍應然」，只是實踐方式不同。哲學家詹姆斯・雷切爾斯（James Rachels）提過一個例子。愛斯基摩人有殺嬰（尤其是女嬰）的習俗，這看似與現代社會保護兒童的「普遍真理」背道而馳。但深入研究後發現，該部落生活在資源極度匱乏的地方，如果不限制人口，整個部落都會餓死。他們的底層邏輯依然是「為了群體的生存與繁衍」（這是一種普遍價值），只是在極端環境下被迫做出了殘酷的抉擇。

日本小說《楢山節考》亦有類似的故事，這部小說描述日本信川山區一個貧窮村落的殘酷習俗：只要是年過七十歲的長者，都必須由自己的子女背到山上遺棄，任其自生自滅，這是因為這個村莊糧食不足，長者要「犧牲小我，完成大我」。這並不代表殺嬰或者遺棄長者是道德正確，而是說，即使在看似極端的文化行為背後，人類往往仍然共享某些底層價值，例如生存、延續群體、保護家庭。

自我否定

還有，某些極端相對主義者甚至會宣稱「不存在任何普遍真理」，但這種說法本身便容易陷入「自我否定」（self-refuting/self-defeating）的邏輯泥沼，如果「沒有普遍真理」這句話是絕對正確的，那麼這句話本身就是一個「普遍真理」，從而否定了它自己的內容。如果「沒有普遍真理」這句話也是相對的，那麼這句話就只在某些時候、對某些人成立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別人完全可以說：「對我來說，普遍真理是存在的。」因為按照相對主

義的邏輯，別人的「絕對主義」在別人的系統裡也是正確的。這種宣稱在哲學上被稱為「認知自殺」（Epistemic Suicide），它試圖建立一個規則，卻把建立規則的工具給摧毀了。

後現代主義挑戰知識霸權

不過，若果將文化差異改在後現代主義的框架下去審視，那又是另一回事。後現代主義最具代表性的定義是來自哲學家利奧塔（Jean-François Lyotard）。他指出，後現代的特徵就是對「宏大敘事」（Grand Narrative）的懷疑。「宏大敘事」就是那些試圖用一個單一、絕對、普遍的框架，去解釋人類歷史、社會和真理的理論。例如啟蒙時代的「理性萬能論」、馬克思主義的「階級鬥爭歷史觀」、或者新無神論運動的極端「科學主義」。後現代主義不是說這世界上沒有真理，而是警告我們：當某一種理論宣稱自己掌握了唯一、普遍的絕對真理時，它往往會壓迫、排斥、或邊緣化其他型態的知識。因此，它提倡的是「微觀敘事」（Local narratives），即關注特定脈絡、特定文化、特定群體底下的地方性知識，亦即是知識多元化。

結語：民主自由價值在不同文化中遇到阻力

一方面，我並不會將自由、民主、人權、法制視為西方獨有的價值，其實，這是基於造物主賦予普遍人性而衍生出來的普世價值，人性渴望自由，而不想被勞役；人性渴望自己有話語權和受到平等對待，而不想被壓制；人性期望自己的基本需求受到保障，而且能免於恐懼。但另一方面，利奧塔提醒我們去反思：西方在推廣這些普世價值時，有沒有帶著大國沙文主義的傲慢、忽視了自由民主在其他文化脈絡下實踐所面對的挑戰呢？九一一事件之後，小布殊總統認為民主化能夠清除恐怖主義的溫床，然而，隨後伊拉克的亂局和阿富汗塔拉班捲土重來，帶來了一個過度高舉普世價值、漠視文化差異的慘痛教訓。無論我對特朗普的觀感是什麼，我仍然衷心希望伊朗人民能夠擺脫高壓統治，當前中東局勢仍然動盪不安，我希望特朗普不會重蹈小布殊的覆轍。

2026年5月16日

原載於夏威夷版《號角》

更多資訊